

专业军事教育必须重视威慑研究

Deterrence in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保罗·I·伯恩斯坦, 美国国防大学高级研究员 (Paul I. Bernstein, Senior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

当前, 我们不断听到和看到有人在敦促, 认为美国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威慑, 认为那些曾经针对冷战现实危险提出各种战略概念而引导西方从中胜出的智库和整个理论界, 现在需要重新构建。这样的敦促来自四面八方, 有政界和军界高层领导人, 有领域专家, 还有军事评论家们——他们的关切不无道理。凡关注时事者都不会否认, 我们现在面临的威慑挑战大异于冷战时代, 其复杂程度在某些方面更甚于后者, 甚至超过后冷战时期的初期阶段。正在显现的安全环境表明, 我们面对的对手更加多元, 他们拥有的常规和非常规能力也更加多样; 因此, 我们必须认识到, 新的危机和冲突, 可能以我们未曾经历、无法预测、难以推演的方式发生。我们在冷战时代经常思考的问题——如何促进稳定、如何慑止核攻击、如何管理冲突升级风险——目前仍然存在, 但是相关环境背景已然换新, 诸多新的因素, 例如网空武器和“混合战争”等, 加入这幅新背景。

面对这一系列挑战, 美国国防部从各个主要方面做出响应, 在概念研讨、计划制订、作战能力、领导人态势感知, 以及教育等领域都在加以推进。这些努力取得了某些进展, 例如, 加深了对潜在敌人军事理论的了解, 正在开发可指导作战规划的威慑概念, 此外, 战略部队的兵棋推演和实战演练越来越注重冲突升级的复杂情景。但是在区域层面, 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PME = 专业军事教育

各地区作战司令部仍难理解常规冲突如何可能升级到核冲突层面, 以及这种升级对美国战役计划意味着什么。目前正在形成的关于地区威慑和防卫的一些重要概念, 把对这些问题的考虑集中在如何在抗衡作战环境中确保常规力量投送, 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但是这些概念将如何影响一个地区的核动态发展, 或如何受其影响, 尚未得到充分研讨。不过相关部门和专家逐步意识到这种关联, 认识到在评估支撑威慑和防卫的未来作战能力时, 必须要求此类作战能力做到不仅在力量投送而且在战略作战的所有方面都具备优势。

然而, 我们的专业军事教育 (PME) 并未重视当前的威慑问题。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 高层领导下达给 PME 教育界的指导方针没有强调、甚至没有提出这些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发的《军官专业军事教育政策》提供了涵盖战略、战役和战术领域的全面的军官教育框架, 但是令人不解地没有重点指出在 PME 教育中讲授威慑课题的必要性。¹ 也许有人说, 上述政策所界定的任何特定学习目标都包含了威慑课题。但是, 反过来也可以说, 疏于把威慑课题特别是地区性核威慑课题明确列出, 造成我军 PME 教育的一个严重缺口, 势必对教育内容产生负面影响。事实上,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许多场合听到多名现役和退役的高级指挥官们说, 他们在区域指挥职位上遇到威慑和冲突升级问题时, 感到胸中无数, 没有充分的准备。

* 笔者的两位同事 Charles Lutes 和 Robert Peters 对本文提出宝贵意见, 特致感谢。

高层领导充其量只是发出了一个微弱的“需求信号”，推动 PME 院校自行调整其核心课程，以涵盖威慑、冲突升级、跨域冲突和核阴影下的危机管理等重要内容。这些课程一般都完全遵循目前的《军官专业军事教育政策》要求，而任何尝试讲授新内容的举措，往往会遇到管理人员和教员群体的抵制。据笔者所知，近期内并未对专业军事教育系统做任何正式评审，没有评估高级和中级联合作战院校及各军种院校如何处理威慑课题。当然，核心课程并没有完全忽视威慑课题，但是通过对 PME 教育界人士的广泛接触，笔者发现在整个系统内，威慑作为一个主要学习课题并未受到应有的深入或系统化重视。尽管个别的学术或研究人员可以自由地提供威慑选修课，但是，即使第一流的选修课也只能吸收少数学员（这样的例子不少）。

有些院校在这方面做得稍好些。例如，空军把有关威慑和核保障的关键思路确立为空军核部队“飞行计划”的支柱之一，其目标是保持一个正式的计划，培养具有战略威慑和核保障理论、实践及经验等全面知识的官兵队伍。空军大学提供支持课程，例如两个学期的选修课，涵盖密集型学术讨论、现场学习以及关于核战略、技术及政策的独立研究。还有一个专业进修计划，向核部队人员提供课堂教学，进修学员包括低级军官至高层军事和文职领导人。在海军战争学院，富有竞争性的马汉学者计划（Mahan Scholars program）向学员提供强化型学习体验，内容涉及美国国家战略和常规、核、网空及太空领域中的战略威慑和冲突升级。该计划包括 90 个小时的课堂学习及一个大型研究项目。

诸如此类的课程和计划，对于确保 PME 教育认真和系统地对待威慑课题的整体目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而应该得到鼓励。但是，

它们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法应该包括下列各项措施。

修订指导方针。下一次评审和修订《军官专业军事教育政策》时，应该明确列出关于威慑课题的要求。这么做将向 PME 教育界传递一个关键的需求信号，表明领导层希望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有实质意义的教育内容。从现实角度讲，由于《军官专业军事教育政策》的修订版已在 2015 年 5 月颁发，很可能在今后几年内不会有重新修订的机会。因此在新一轮修订之前，需要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例如，在下一个学年和其后，应该把当前威慑问题指定为 PME 教育的一个“特殊重点领域”。²

客观评估缺口。领导层应该任命专人进行正式的全面评审，了解高级和中级联合作战院校及军种院校的核心课程以及将官进修课程，如“Pinnacle”和“Capstone”课程（编注：由国防大学设计，前者是为 2-3 星将军开设的顶峰课程，后者是为新晋 1 星将军开设的顶石课程）等，如何处理威慑课题。此类评审还应该考虑审核初级教育训练和授衔前教育单位，例如各军种的军官学院。评审应该由一个现有的高级顾问机构或临时组建的蓝绶带式高级专家组执行，并且应该由一名高层领导人（例如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任命。或者，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应该使用其现有的权限任命某个合适机构执行评审。该司令的战略顾问组在这个领域所做的工作也许可以作为有用的起点。任何评审都应该考虑指定一个国防部单位作为威慑理论教育的交集协调部门。

制订计划和确定支援资源。战略司令部应该带头制订在 PME 教育中如何加强威慑内容的计划，而且应该带头编写支持计划实施

的教材。该计划应该允许教员灵活应用，应该采用模块式教学单元，以便教员有各种资源可供选择 and 组合。这意味着需要提供教员可以采纳的（并在需要时可以调整的）示范教学计划或教案。课程在设计上可分为三种版本，第一种版本作为核心课程施教，第二种版本作为选修课施教，第三种版本可专注于开展兵棋推演。所有版本都辅之以供教员和学员使用的阅读书目及其他资源，例如涵盖基本阅读内容、概念和分析工具的“威慑入门”教材。还可以考虑为教员建立一个非正式的“回取”支援顾问网络，供他们在需要咨询和帮助时随时获得支援。

倡导威慑教育。战略司令部司令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应该在公开场合和在国防部会议上大力倡导威慑教育。这些领导人的讲话、公开演说和证词都应该强调在正式和非正式课堂教学中探讨威慑课题的重要性。对“威慑作战行动联合作战概念”的任何修订或更新都应该提及在 PME 教育中讲授威慑课题的重要性。

培养专业人才。PME 院校应该努力发现对威慑和相关问题感兴趣的未来领导人，并给予机会鼓励这些学员钻研威慑相关课题。国防大学有若干学者计划，吸收有志研究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欧洲司令部感兴趣问题的学员，让他们专心研究这些课题，研读相关的选修课，获得必要的研究资源，而且有机会向领导层展示其研究成果。国防大学和战略司令部共同主持的一个类似计划以威慑和相关问题为研究重点，该计划已拟定建议书，正在积极考虑中。

建立专业论坛。可考虑建立一个威慑教育年度研习会，为 PME 教育领域的教员们提供一个定期分享教学经验和实践的平台。此

研习会可邀请来自民间学术机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的正式及非正式的教育工作者。威慑教育研习会可安排在战略司令部的年度威慑专题研讨大会期间举办，或者，如果不作为正式的研习会，战略司令部可以考虑把关于威慑和 PME 教育的讨论列为其年度威慑专题研讨大会的一个固定议题。

切勿忘记继续教育和专业发展。正式 PME 教育只是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诸军种联合举办的或各军种单独举办的进修和专业发展课程也很重要，这些课程不一定需要与拥有学位授予权的 PME 院校挂钩。目前迫切需要给低、中、高级军官及文职人员提供学习、跟上最新进展以及与领导层沟通的机会。此外，这也是填补正式 PME 教育系统中缺口的一个机会。上文所述的空军开设的核威慑专业继续教育计划是一个有用的范例，联合作战教育界应该仿效，既然已为将校军官们提供了网空、信息和特种作战进修课程，应再增加威慑课程。其他一些非正式的专业发展机会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国防部系统的各个部门存在许多这样的机会，但是目前不清楚这些各自为政的活动如何处理威慑课题。空军参谋部的空军国家安全研究院举办的战略政策概述课程适合从事实际工作的专业人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鼓励专业军事教育研究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应该鼓励所有的 PME 院校，尤其是拥有较强研究能力的单位、研究人员和专业领域专家在工作中探索威慑课题，他们可以成为决策者获得启示性概念和实用建议的一个重要来源。PME 教育机构还应该积极促进教员把威慑研究成果及时融入课堂教学。在有些院校，这也许是正常的做法，但是所有的院校都应该尽可能有意识地让其成为常规。PME 院校以外的分析活动成果，例如高层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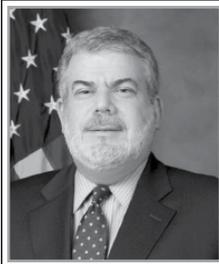
棋推演的结果和战略司令部战略威慑评估实验室的工作成果，也应该融入课堂教学。

最近，高层领导人号召严格加强 PME 教育制度化，指出教育是我们抵消敌方军事能力的一个关键途径，而且我们的 PME 教育系统是一项战略资产和非对称优势。对于威慑领域的教育和实际工作者，不言而喻的是，我们必须积极探索涉及威慑和区域冲突的一些关键问题，才能发挥这种优势。国防部是

否认同这种观点，我们不久就可看到一个“实时”风标，这就是，各军事部门目前正协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长办公室进行一项研究，目的是识别合适的政策和资源使用方法，确保 PME 院校毕业生获得充分的教育训练，能够了解和应对越来越复杂的敌人的作战理论、思维和能力。该项研究的结果将在 2015 年 7 月下旬向国防部副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通报。♣

注释：

1.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struction 1800.01E, Officer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Policy (OPMEP) [军官专业军事教育政策 (OPMEP)], 29 May 2015, http://www.dtic.mil/cjcs_directives/.
2. 2014 年专业军事教育特殊重点领域包括军人职业；妇女、和平及安全；安全部队援助；以及建立合作伙伴能力。



保罗·I·伯恩斯坦 (Mr. Paul I. Bernstein), Binghamton 大学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文科硕士，现为国防大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及该校研究教授。他从事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政策、威慑、裁军及地区安全相关的一系列政策支持、调研和专业军事教育。先生曾任国防部威胁减轻咨询委员会顾问，现任国防科学委员会威慑、防止及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用威胁特别小组顾问。他是各军种高级作战学院及其它专业军事教育院校的定期客座讲师，并设计了有关核武器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课题的多门课程。他的新近著述包括编写《21 世纪的有限核战争》(斯坦福安全研究系列，2014 年)一书中的两章，及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心撰写了下列专著：“民用核电项目的扩散风险”(与 Nima Gerami 合著)、“纳恩·卢格与合作性威胁减轻的来源”(与 Jason D. Wood 合著)、“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顾与前瞻”(与 John P. Caves Jr. 和 W. Seth Carus 合著)，及“核前景的未来”(与 John P. Caves Jr. 和 John F. Reichart 合著)。